

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及其价值重塑

——以江南传统村落为中心

汪瑞霞

内容提要 传统村落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维系文化认同、保留民族文化多样性和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根基,它通过物质和非物质的形式反映出村民主体的文化素质、价值观念、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是一个由人、文化和自然互融共生的人居环境系统。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中环境生态、空间生态、市镇生态、人文生态诸要素构成了相互作用的整体关系。传统村落的当代实践案例表明,文化诠释的整体观念、文化建构的设计维度、文化振兴的核心目标是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价值重塑的基本着眼点。

关键词 传统村落 文化生态 人居环境 特色小镇

汪瑞霞,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博士生 210037

引言

传统村落即古村落,是指在县城以下广大地区中“长期生产、生活、聚居和繁衍在一个边缘相对清晰、特定地域中的农业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元”^[1],拥有聚落和建筑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文化形态。传统村落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政治、文化活动的场所,也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场所,其分布、形态和内部结构等反映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间的综合关系,具有较高的多元价值。“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植根于农村这个乡土社会。”^[2]包括农村经济、农民生活及其社会心态等实际状态,保留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学者罗德胤将中国的传统村落划成了四个片区:即汉族片区(以汉族文化为主导);民族片区(以民族特征为主);民系片区(民系分化现象明显,如华南地区的民系可分为客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特色小镇’建设与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发展研究”(17BH173)阶段性成果。

[1]刘森林:《中华聚落:村落市镇景观艺术》,[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费孝通:《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上海]《社会》2005年第1期。

广府、闽南、潮汕和雷州);混合片区(包括东北、台湾和海南等)。当然这一分类法并非泾渭分明,每个片区的交界地带都会存在一些难以明确归类的传统村落。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中国不同地区传统村落各自特点更加突显,江南的“水乡小镇是江南地区古代经济社会的一种独特形态,对于促进地域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1]。从历史空间演变过程来看,“江南”概念界定和范围的划分因时间和视角不同,历来范畴不一。在较早的古代文献中,“江南”一词仅用来表现特定的地理方位,与“中原”“西域”“塞北”“岭南”等地理名词一样,并非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区划。先秦史书中的“江南”,包括现今浙江、江苏和安徽等省一带,在周秦之际《禹贡》中的江南隶属于“扬州”^[2];至唐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长江以南为江南道;北宋至道年间(995—997年),又将镇江以东的苏南和浙江全境定为“两浙路”,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狭义的江南范围之界定;到明代,江南盛兴,董其昌著曰“公一览立得,籍甚神君,讫威讫富之誉,为江南冠矣”^[3]。清初江南省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两省,江南省与江西省统称为两江总督。江南传统村落文化是中国“汉族片区”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以江南传统村落为研究中心,这里的“江南”是狭义的,特指中国长江下游以南的环太湖区域,包括现在行政区划中的苏南、浙北、上海等地区。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是维系华夏子孙文化认同和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根基”^[4]。传统村落文化,指传统村落区域范围内产生的、经过长期历史进程积淀下来的农村人居文化,是一种以农民为主体创造和形成的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农民的理想、感情、信念、价值观、道德、风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5]。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具有乡土性、宗法伦理性、封闭性等显著特征。然而,当今社会伴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自然环境污染、人际关系冷漠等城市病蔓延,乡村建设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失忆、失范、失序、失衡等一系列棘手难题。传统的农耕社会已经消失,传统村落受到巨大冲击,传统村落的文化“物种”正在迅速消亡,数千年来乡村稳定而均质的生存状态完全被打破,寻找失落的乡愁成为国人共同的心理需求。中华传统村落原生的文化生态核心要素有哪些?其整体平衡关系如何修复?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价值与贡献如何彰显?面对乡村的衰落,人们开始重新探寻一种适度舒适的、可持续的、人性化的、具有情感与质感的乡村生存方式,期待重塑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核心价值。

一、中华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核心要素

中华传统村落的选址和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村落的聚合方式给村民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认同感,这些集体的心理体验和文化认同在传统村落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既有利于传统村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也维系着本地区凭借地缘和血缘关系组合而成的聚落生活、地域感知、空间意识和文脉基因。聚落考古学非常注重对聚落和居民社会的整体研究,按照“中间位置理论”,把聚落当作先民活动的“组”和平行的“网”,认为聚落单位之间的共生、互补关系,可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宗教、婚姻等等关系上的,也可能来源于文化的风格;完全相同的聚落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聚落形态的伴存文化,反映了“空间上的连续性与时间上的稳定性”^[6]。中华传统村落的文化变迁

[1]汪健、黄健勇、费薇分:《浅议江南水文化的特色与发展思路》,〔北京〕《中国水运(下半月刊)》2011年第11期。

[2]周振鹤:《释江南》,《随无涯之旅》,〔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8页。

[3]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页。

[4]高成全、赵玉凤、李晓东:《新型农村发展与规划》,〔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4页。

[5]朱启臻主编:《农村社会学》(第二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125页。

[6]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8—84页。

史记录着每个历史阶段社会文化的整合水平,反映了中华民族神形交融的整体发展过程。居住行动方式、生产生活方式、交流活动方式等有“形”的物态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具有“原生性”特征,体现在中华传统村落文化的环境生态、空间生态、市镇生态、人文生态等动态发展的过程中。

(一)内向稳定的传统村落环境生态

地理环境、地形地质是影响聚落选址、建筑形制风貌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和载体。古代中国人生存的地理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受地域环境的限制,构成一种“半封闭式”的发展模式,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向心的,向中间看齐;二是推演式的,周边地带参与内向系统,融于其中,形成内向聚焦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与环境生态^[1]。中华民族以中原为中心的内向性特征,影响着华夏大地良性稳定的大结构,内部又各自形成下一层级的向心结构,与之相应的建筑形制和尺度、个人生活方式、家族结构形式等都同步调节,这就是中国文化数千年保持稳态平衡的环境基因。气温和气候变化、不同的地形地貌和地质基础提供多样化的建筑用材和相应构筑方式,形成不同的生产技术和防护措施,成就了传统村落在建筑构造、空间肌理、材料质感、风格样式和历史风貌上的地域性。人们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适应不同气候条件的建筑技术和防卫措施,总是选择有利的自然因素来创造更加适合于生活和生产的环境,例如“底层架空支承、二层平坦人居”的干栏结构模式,就是南方人为了适应南方雨季多、潮湿、炎热等气候因素和居住地崎岖不平、岩石坚硬等特殊地形地貌而长期形成的。

中国传统村落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自身动态调节,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地域特征和生态平衡关系。中国古代祖先对聚居环境的选择极为慎重,总是选择有一定闭合度或者以自然山水为中心的空间,有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庇护感和认同感;依托一个集聚中心往空间两侧按照一定的方向展开,形成具有深远延展性的空间界面。环境与人们的技术行为或者文化习俗是相适应的,多样化的环境会影响人的感知、态度与世界观,在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人对环境的看法会不同。一般来说,地处山区的村落景观层次变化十分丰富,为人们提供极富变化的仰视、俯视效果;与之对应的江南水乡临水而居,河网密布,村河相依,是闻名世界的“渔米之乡”^[2]。如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水乡古称“吴中泽国”^[3],《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在苏州的北野和西野有“胥卑虚”“胥主瞪”“大瞪”“鹿陂”等吴国成片农田的田段名称。《吴地传》说“鹿陂”是“吴王田”,说明它是堤内成田的农田,而不是蓄水的陂塘^[4]。江南也是我国最早开凿运河交通的地区之一,周朝先祖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在今无锡梅里建吴国“泰伯渚”、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开“胥溪运河”、公元前495年夫差开河通运。经历唐宋的开渠疏浚,太湖流域水陆交通相当发达,形成“以江南运河为骨干的水乡交通网络”^[5]。江南河湖密布,文风鼎盛,人文荟萃,水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是影响聚落地理空间生成的关键因素和基础前提。中国传统村落并不是经过人类所谓的“设计”得到的,而是经历了祖祖辈辈持续不断地无数次的试错、适应与改造而形成的,而且自然环境对人的认知影响较大,这种影响与伴随人类成长的物态和不同朝代文化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

(二)自发有序的传统村落空间生态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是一个集地理、气候、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意义综合体。宏观意义上

[1]沈福熙、刘杰:《中国古代建筑环境生态观》,〔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4页。

[2]王建革:《水文、稻作、景观与江南生态文明的历史经验》,〔武汉〕《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3][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白龙生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4]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5]周学鹰、马晓:《中国江南水乡建筑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3页。

的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要素包括天、地、人、建筑等；微观层面分物质和非物质要素，有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街巷、院落、广场等具体物象在统一的秩序下形成特定的景观空间形态和意义，形成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景观结构。中国传统村落空间的形成带有明显的自发性，世代相传延绵至今。村落自身的发展过程犹如细胞分裂，聚集到一定的规模就自然分家解体。按照彭一刚的分法，根据地形地貌可分为“平地村镇、水乡村镇、山地村镇、背山临水村镇、背山临田畴村镇、散点局部村镇、渔村和窑洞村镇”^[1]等类型。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具有“相似性和复合性”，按照空间形态来分，其组合模式可以分为：围合空间形态模式（有河道成网络状、平面形态呈团状的团形镇），中心空间形态模式（以多条河道为轴发展、平面形态呈多触角式向外伸展的星形镇）和线型空间形态模式（以一条明显的主河道为主轴、平面形态呈一线的带形镇）^[2]。中国传统的建筑空间是套叠的，从人的活动空间来说，屋里屋外空间层次是内向型的。地处太湖南岸，湖、苏、嘉三府交界处的“江浙雄镇”南浔镇是一个典型的“十字港为中心的闹市”^[3]。追溯其历史，宋代丁昌朝祇园寺碑记载：“城东有塘曰获，不及三舍，有溪曰浔，在浔之北，有寺曰祇园。”^[4]获塘为东晋太守殷康所开，此后历代都有重修，运河与获塘仍在发挥着作用；浔溪设坊，“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贾之所萃”^[5]。可见南宋时的南浔已经地处商贸繁华的中心位置，明清时更是趋于兴盛，出现了规模巨大的丝商群体。今天的南浔，“浔溪穿镇而过，溪上有石桥 72 座，重叠耸起的山墙，极具秩序感的圆拱过街券门和沿河临水廊檐，在人的心理深层建立起一种内向层次型”^[6]的空间感。

传统村落交通的复杂程度与其规模有关。段进等人对环太湖江南古镇空间作了深入研究，将其空间结构分为三种原型^[7]：（1）互融共生的空间“群”结构，即系统各元素互相关联组成整体的构成关系。江南古镇可抽象为“等级子群、并列子群、链结子群”三种结构模式，形成“以同一性、横向共时性为基础的非线性多重网式相关的构成关系”，三种子群是互相融合的“复合群”。（2）依河延伸的空间“序”结构，即空间要素之间的次序关系。整体空间结构的“序”包含着街巷水网空间与住宅空间，不仅体现了古镇演化的先后次序，还展示空间序列形成的过程，更是“空间序列、空间演化、空间等级”三种次序结构的综合。（3）纵横交融的空间“拓扑”关系。拓扑网络法是以具有拓扑性质的区域、骨架、核心等空间概念为载体研究城镇的总体结构，通过对各镇的结构进行横向比较，拓扑网络证实了古镇空间“群”和“序”的结构分布情况，三者形成互生共存的关系。

传统村落的标志性景观有宗祠、寺庙、民居、水口、大树、古桥、牌坊等，在村落物态环境中具有统领空间、点睛醒目的作用，节点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形和势相融合，形成视觉停顿或者聚焦之点，在空间上统摄全局。在形式构成上，村落建设常常选择当地城市中常见的主要建筑为模仿对象，以小巧的体量和亲切的尺度，简化为园林式的亭台楼阁；同时村落景观布局极具灵活性，结合乡村自然资源和自身特点，对外通过与大自然山水的整体构景拓宽景致视野，对村落内部重点规划街巷和重要节点景观，巷院交融，参差错落，增加了村巷空间的复合功能，街市、民居、过街楼等点缀其间，加强了不同景观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强化了街道的线性体验和错综迂回的空间意象，成为具有集体文化识别性的

[1]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60 页。

[2]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1 页。

[3]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73—683 页。

[4]道光：《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浔溪祇园寺庄田记》。

[5]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安吉州乌程县南林报国寺记》。

[6]顾孟潮、张在元：《中国建筑评析与展望》，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9 页。

[7]段进等：《城镇空间解析》，[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63 页。

记忆场所。

(三)自给自足的传统村落市镇生态

传统村落的发展离不开商品交换的场所,即集市。市镇源于集市,明清地方志中有关于“市镇”^[1]概念的定义。明弘治年间的《吴江县志》称“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明天启年间刊刻的《吴兴备志》则说:“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清乾隆年间的《湖州府志》曰:“田野之聚落为村,津涂之凑集则为市为镇。”可见,“市镇”的必备条件一是人口数量大密度高;二是商业聚落;三是交通便捷。当县以上层次的城市“由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化”^[2]时,大量市镇发展成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各地的集市既有同一性又有多样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以及地域性差异,极原始的不定期集市与高度发达的日常集市同时并存,庙会与集会都伴有集市贸易,已经成为中国乡村悠久的文化传统。江南市镇的地理结构可以区分为一河二街型市镇、丁字港型市镇、十字港型市镇,大大小小的市镇之间不是孤立的,在沟通村—乡—市—镇—县—府不同地理层次的物流与人流中,显示出强大的网络体系功能,这是单个市镇所无法比拟的。明清江南的经济发展刺激了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也激活了江南集市,不仅规模数量在增加,集市的内部结构也日趋完善。江南市镇,“已经超越了一般集市的水平”,“成为高于集市的地域市场或超地域市场”^[3],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工业中心、文化中心。

商业与文化是市镇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翼,“市镇活动向周边乡村扩散,使许多乡村在文化、生活和社会风气等方面与市镇趋于一致”^[4],当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必然同时会对人口的数量、市镇结构和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明代至民国,江南市镇的人口多是一千数千户以上,如:同里镇在正德、嘉靖年间的居民达二千余户;清初以来,“居民日增,市镇日扩”^[5],染坊、机坊、练坊、踹坊、糟坊与花行、丝行、布行、绸行、木行、竹行等民间百业形成前店后坊空间格局,构成了一个由士大夫、商人、脚夫、乐人甚至市井流氓等不同社会角色日常交往的充满生机的小社会。集镇给来自不同村庄的村民提供了相遇相识的机会,酒店或茶馆成为村民赶集相会、消磨时间、增进了解、增长见识、扩大朋友圈的场所。村庄也常常通过这种方式联合起来,施坚雅把中国传统社会这种具有社会功能的农村市场称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以区别于作为“空间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市场结构,提出了著名的“集市社区”理论模型^[6]。

商业与文化双向并进,促进了商人与士绅阶层之间的“转型”。如南浔镇创建嘉业堂藏书楼的清末秀才刘承幹,祖父刘镛本是丝业富商,父亲刘锦藻精通文史之学,光绪二十年进士,撰有《南浔备志》《续皇朝文献通考》《坚匏庵诗文抄》等著作。殷实的家族滋养了刘承幹的学识,长期与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缪荃孙,著名考古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等过从甚密,提升了其对文化教育的情怀,后来建成嘉业堂藏书楼,与刘汝藻的密韵楼、张均衡的六宜阁,并称为享誉江南的晚清南浔三大藏书地。

集镇的发展又反哺周边的乡村。明清时代的松江府与苏州府,凭借纺纱织布为主的手工业拓展海内外市场,经济繁荣持续数百年。之后这一地区农村盛行毛巾业、花边业、黄草编织业、竹编业、草

[1]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明清》,〔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2]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上海〕《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3]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4]陈国灿:《浙江城镇发展史》绪论,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5]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嘉庆《同里志》卷一,“沿革”。

[6]〔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5页。

鞋业等农村副业,使农村增添了活力,维持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中国传统社会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农业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双重实现,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运行系统,保障了传统社会文化生态的稳定发展。

(四)生生融合的传统村落人文生态

在中国,传统村落从选址、营造到生产生活,几千年来形成了一整套的空间理论,并受到层次性序列化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法则的制约。传统空间的风水说,抛开其迷信的成分,更多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的需要,是以人为主体的而设定的小型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逻辑秩序,人们在这种空间形式中生存,受到其规范和系统化的支配。中国传统村落营建的特点:一是“与农业生产相联系”;二是“空间的自在性”^[1]。村落宅院总是朝南或者朝东南,院子向外敞开;宅前空地做农活或者晒场之用,利于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周围有树木、池塘,水中有鱼虾。中国古代传统村落的居住主体一是农民,另一类是渔樵耕读的文人。普通农宅平面布局重在功能和自然环境,村规家法、地缘亲缘、族群礼俗等维持着日常的人际关系和业缘关系,以血缘关系所建构的族权体系替代君权体系。传统村落的营造离不开宗教和民间信仰。许多村落富商大甲,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力和文化情怀,也将城里古代园林艺术的借景造园法,用在村落的居住环境中。比如村落的“水口园林”,“水口”,即“流水的总出口”,“盖水口乃地之门户”,流水象征着时间和财富,以“水口”为障景使村基边界里外有所分离,形成不同的领域与空间。优雅的景观是进村前的第一印象,也道出了中国古村落景观营造的意境追求。

丰富的山水环境成就了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深深影响了繁衍生息于此的乡民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左右着他们对于赖以生存的人居环境的评判标准、价值理念,形成一系列朴素的观照衡量、抉择取向的范式。早期传统村落的形成是基于人类因地制宜的生存选择,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类开始从空间审美的视角来审视大自然与人居的关系,出现了从精神层面审美体验的转向,产生了超意识的潜移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很多关于文人士大夫如何相地卜宅、营造物质环境和心理体验相宜的生活空间的描写,谢灵运的《山居赋》就是从方位、江湖山水、花苑、五谷等自然要素来审视基址的空间形态。计成《园冶》里处处可见的景、韵、情、趣等字眼,在传统村落里都能找到。按照王国维先生和刘再复先生的看法,经历了政治的洗礼之后,江南士大夫从“政治—伦理”转向了“诗性—审美”,也是一种由“家国—历史”到“生命—宇宙”的转向,“雅秀”“婉约”的江南建筑可归纳为四种神韵^[2]:即小桥流水人家的空间特征;黑、白、灰的民居底色;轻、秀、雅的风格基调;情、趣、神的园林意境。“江南”在人们的心里超出了地理上的意义,是一种“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忽忆江南黄篾舫,几时归去作遨头”^[3]的理想之境。江南文化的“诗性人文内涵”^[4],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

二、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价值重塑的当代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给城乡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冲击,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催生了个人利己主义的滋长和道德诚信的缺失,流动农民和失地农民的心理失衡、城乡社会矛盾突出,又催生了一种社会文化心理上的普遍“乡愁”。表面上看,“乡愁”这种对故乡的追怀似乎是个人行为,实际

[1]沈福熙、刘杰:《中国古代建筑环境生态观》,〔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4页。

[2]参见刘永:《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81页。

[3]陈寅恪:《追忆游那威诗·北海舟中》,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4]刘士林:《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上海〕《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

上,这是社会主体对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存方式的一种追寻,更是中华儿女对传统文化精神与五千年文明的自省与记忆,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集体文化思潮。如何将这种全民“乡愁”持续地生成为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追忆的特殊情感,凝聚成“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1],引发了学者们更深层的思考。其中欧阳国辉等^[2]从“新农人”(知识青年、艺术家设计师及知识人团体、回流农民工)的角度针对传统村落文化保育提出了值得重视的建议。但是,笔者认为作者提到的这三大“新农人”主体,更多的是将外来的、城市的文化要素和文化观念带入农村,在介入传统村落的力度、时间和内容上都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非持续性和不全面性,城乡两种不同社会主体如何形成合力还有待实践和深究。对传统村落的“文化诠释”“文化建构”“文化振兴”关键在于“价值重塑”。这里的价值可以理解为一种促进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重塑的“积极因素”。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文化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与源泉,“中国城乡文化具有同源性、一体性”“互哺性”“一体多样性”^[3]。我们要在理性区分的过程中深刻把握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本质,以“文化生态”修复更新来促进乡村的“价值重塑”,以“重塑价值”来引导乡村的“文化生态”发展方向,找到适合当代村落文化生态系统可持续的运行路径,以期促进村落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一)文化诠释: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价值重塑的整体观念

从表象看,地球变暖、城市拥挤、大气污染、自然环境失衡等等是工业革命、现代化对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侵害,从更深层次讲,文化生态危机其实与近代哲学思想及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柏拉图“以人的理念构造整个世界”,后经历了笛卡尔“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康德“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4]理论之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等等人类中心主义理论突出了人的主体性,蕴涵着科学的精神,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启了民智。但现代研究越来越多地证明,人并不是一切价值的来源,人以外的生命和自然事物都有其内在价值,人和社会、生命和自然界两种利益尺度都具有合理性。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开启了人类生态学的研究,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海德格尔将地球比作一棵美丽的“开花树”^[5],人类应重建“诗意地栖居”的和谐家园。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适应理论”^[6],探讨不同地区独特的“文化核”(文化特征和文化范式)与特定环境、技术构成、社会制度、生产设计等要素之间动态发展的因果关系。汤恩比突破“英国本位”,坚持文明社会在哲学的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同时代的、等价的“世界史观”^[7]和时空观,期待从东方哲学寻找突破的智慧,以利于人与自然可持续和谐发展,引发世界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关注。

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价值重塑,要树立“文化生态的整体观”——一方面主张融贯中西,摒弃西方工具理性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对立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对传统村落文化生态诸要素不能孤立看待,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体现着国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审美观念和情感愿望。传统村落文化

[1][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2]欧阳国辉、郭佳:《传统村落文化保育中的“新农人”介入研究》,〔长沙〕《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3]徐之顺:《城乡文化:基于文化认同的和谐共生》,〔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4]吴家正、尤建新:《可持续发展导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9页。

[5]曹孟勤、卢凤主编:《中国环境哲学20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0页。

[6]参见刘森林:《发展哲学引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37页。

[7][美]朱利安·斯图尔德:《文化变迁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2页。

[8]参见徐复观:《徐复观全集 论智识分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56页。

中的“仁义礼智信”“和而不同”等儒家思想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关系”^[1]等普适文化基因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和主要底色;同时吸收消化西方文化中的文明成果,创建一种更加符合当代人精神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其哲学基础之一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对立统一”^[2]等思想。具体体现在:

一是重塑传统村落文化生态自信,树立“生生之德”的整体观念。中国特有的“生生哲学”^[3]把人的生命展开去契合宇宙生命,从一个生物体的生育、生长和人的生产、生存等基本要素出发,探寻一种文化生态的价值观。“生生”是万物生命之源,是生命创造的不竭动力,衍生出“创生”“生意”“乐生”“和生”“厚生”等等,“生生融合”将生态平衡、生产生活、生命关怀等人的思想和方法有机融入,体现出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统一。二是回归传统村落文化生态本元,强调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与系统观。我国一贯推行阴阳五行互相转换、相生相克、多业并举的循环思想,中国古代作物强调轮作,土壤提倡轮耕,强调能量循环,保持地力常新。南方太湖地区的传统农牧桑蚕渔系统等就是生态农业思想的最好实践。回归以“善”为核心的温厚伦理,把整个村镇空间看作一个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文化生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元素任意掠夺和获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乡村治理实践成效显著。在“记得住乡愁”的召唤之下,两部优秀纪录片CCTV《记住乡愁》和浙江卫视的《中国村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纪录片每集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中国传统村落的风土人情和独特文化,讲述着不一样的传统村落文化传奇,孝道传家、讲和修睦、积善成德、天道酬勤、宁静致远、节义立家、自尊自强、远亲不如近邻、诚信赢天下等等主题鲜明的祖训,浓浓的乡情乡音、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触及到人们心灵苦苦探寻的那种潜在的乡愁记忆图景。

(二)文化建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价值重塑的设计维度

由古希腊西蒙尼·戴斯发明的神秘的“古典记忆术”^[4]开启了“使用场所和形象的记忆方法”,从柏拉图到休谟、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从艾宾浩斯到巴德利,记忆作为主体的心智活动之一,一直是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5]。在达尔文的时间框架中,“记忆是对已经过去的时间的意识”^[6];哈布瓦赫首次正式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和“记忆的社会框架”^[7],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行为。传统村落是“阐释空间和地方性意义的组成部分”^[8],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价值重塑离不开对村镇文化记忆的建构。如何借助传统村落这个日常生活空间,将传统村落重塑为一个记忆的容器、传播精神意义的媒介和当代空间再生产等多元价值的综合体?其建构的原则要突出“本土性”和“融汇性”。本土性是将地域物质与非物质要素作为文脉传承的要素和传世珍稀资源来养护;融汇性是指产业结构转型调整策划、环境更新的规划、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资本集聚的谋划都要整体考虑,通过科学的规划设计,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域,形成特定的行为方式。通过深度与广度的调研,针对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实际情况,做到准确把脉、定量分析,分类汇总收集具有当地乡土特征的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意象资源。一方面要回归乡土,适度设计。尊重自然,珍爱土地,尊重百姓民俗信仰,协调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融会贯通;

[1]赵哲伟:《环境资源法学》,〔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53-56页。

[2]刘国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6-81页。

[3]董根洪:《传统生生观——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4]见〔英〕耶茨:《记忆之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25页。

[5]见白洁:《记忆哲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6]法拉·帕特森:《记忆》,户晓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129页。

[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8]汪芳、吕舟等:《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北京〕《地理研究》2017年第36期。

另一方面要规定保护红线,一村一规划,多规合一。加强对传统村落空间生态要素的保护与修复,抢救当地的历史文化物质载体和场所,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认定、评估和保护原则严格执行。这方面,“空间整合,功能复合,艺科融合”是当前特色小镇创新设计的三个维度:

其一,空间整合——塑造乡土空间。充分考虑传统村落的可持续性发展,先从宏观上考虑村落产业的差异化和内生秩序,尊重地方性特色,从环境整治、资源利用、生态修复多方面认同村落文化生态的当代价值。通过提取村落景观建筑文脉基因中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借助当地乡土材料开展科学而有序的更新,建构乡村的集体记忆,如王澍从建筑类型学视角强调“繁复的差异性变化”^[1];张雷用一种精心选择的“适宜技术”去延续固有的空间环境秩序^[2];陆邵明认为需要针对中国当下的语境,设定好“空间的情节”^[3],讲好中国故事。

其二,功能复合——激活乡土产业。以传统村落社会既存的资源为基础,促进乡土特色产业的融合发展。传统村落的建设包括居住、商业、生产、公共服务等综合复合功能,可以从衣食住行的微观层面,根据项目组建团队,打通设计学一级学科之间的专业壁垒,建成集环境设计、公共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智库与建设队伍,同时以设计为中介,加大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以设计+农业、设计+游学、设计+体验等方式,为乡土产品、品牌塑造、工艺技术、乡土资源找到更合适的创新开发路径,打造民俗文化艺术节、民间集市、土灶头私房菜品、特色乡镇的土特产包装比赛等丰富多彩的品牌活动,建构生活记忆。

其三,艺科融合——强化乡土记忆。在充分发挥当地材料工艺、营造技艺的基础上,加强现代技术与艺术融合,强化村落文化集体记忆内容的可视性和传播力。利用互联网技术、农产品交易APP等高科技手段,综合视听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增进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提高社区活力,实现乡村生活品质的整体提升,形成交流、传播和体验集体记忆的当代策略。强化文化认同的载体,使乡土技术与高科技、传统节庆集市民俗宗教活动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文化活动相融合。

当前,融合产业、文化、旅游等多要素综合发展的“特色小镇”是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发展的新载体和重要契机。传统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农耕文明之精髓,是建镇之基石,是特色小镇内涵品质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在苏南常州“金坛区薛埠镇仙姑村的整体更新”过程中,项目组没有直接孤立做村庄的建筑设计,而是将其放入周边的自然环境和产业背景中:距离仙姑村15分钟车程范围内有茅山景区、盐湖城特色小镇、一号农场等主要景观:茅山是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被道家称为“上清宗坛”;配套开发的特色小镇“东方盐湖城”独特的“精、气、神”将神灵、宝物、筑景、互动、经营有机融合,相互阐发,运用大量以高科技手段阐释传统文化的记忆艺术,构成完整的道教文化旅游体验体系;一号农场是一个智慧有机农庄。农事道教文化体验、蔬果采摘、亲子牧场、萌牛菜园、好奇乐园、丛林探险、露营小岛、特色活动、垂钓中心体现了一二三产融合的业态。仙姑村的更新设计是基于以上周边乡土记忆资源提出的一个差异化的设计概念:“乡村客厅”。主要通过使用当地乡土材料如砖、石、竹、木、棉、麻等,打造村史纪念馆和特产展示厅,在主题形象上传达出仙姑村人乐善好施的仙姑精神与勤劳淳朴的百姓民风;设计风格上确立了质朴厚重的基调,使仙姑村成为天然的养生福地和当地农特产品集散地。四个不同类型的乡村景观,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记忆载体,它们相互支撑,促进了当地村镇产、城、文、旅的一体化发展。仙姑村由此成为苏南融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于一体的典型案例

[1]王澍:《隔岸问山——一种聚集丰富差异性的建筑类型学》,〔北京〕《建筑学报》2014年第1期。

[2]张雷:《类型的乡土重构》,〔北京〕《建筑学报》2011年第1期。

[3]陆邵明:《本期聚焦:记忆场所保护与活化利用》,〔南京〕《现代城市研究》2016年第8期。

和美丽乡村示范项目。

(三)文化振兴: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价值重塑的核心目标

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多部委联合启动中国传统村落调查工作,就自然景观、历史建筑和人文内容三大部分,明确整体性保护细则。各地纷纷响应,突出民生主体、文化振兴,探索了一条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创新之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传统村落自然生态的修复与维护。每个国家实用性的农耕礼制、建筑及生活方式都是与其气候土壤、地形地貌、水源与耕地适宜性相关联的,影响着传统村落的生态环境和建造形式。如:“瑞典农庄是由锯木木材建造而成的”^[1],围绕着猪舍种植树木,可以使农庄与其畜禽舍的建造材料有着视觉和实际上的关联性;荷兰平原地区因对土地使用严格控制,农庄呈紧密组织状态;奥地利山区的农庄房子和畜禽舍通常从动物那里获得热量,同时也更方便照料和喂养动物;英国乡村景观对美国乡村农庄的环境设计影响很大,村庄整合出一些绿色空间作为社区活动场所,有着无限的多样性和美丽的细部,给人们带来视觉和精神上的愉悦。因此,从历史性、系统性、多样性、原真性、可持续性几个角度出发,对村域既有生态环境,村域范围内的风景名胜、山川河湖、地形地貌、文物古迹等要加以整体保护,加以控制与引导;对于影响整体风貌的不利因素加以整治清理,彰显特色,以提高村落的综合价值。

二是传统村落空间生态的保护与利用。村镇记忆储存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回归生活是传统村落物态空间存在的核心。传统村落空间生态的保护与利用应该采取一种“柔、静、慢”的规划态度。我国首批开展的“国保省保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工程”分布在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9个区县,共51个村落参与,不论是乡土建筑还是传统村落,其类型都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典型性。可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专项资金,实施“废旧房屋认养利用计划”和“传统村落活化策略”,设置不同的资金申请、使用方式,加大对展示利用(阐释展示与活化利用)项目的扶持力度,如建成传统手工艺研习所、特色博物馆、公共文化活动中心、孩子阅读室等,将传统废旧建筑修复利用,再造记忆故乡。

三是传统村落市场生态的激活与发展。随着经济转型,乡村传统农业和手工艺生产面临巨大冲击,新时代的创意设计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型业态。潘鲁生认为,“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促进乡村全面发展,不仅要消除经济意义上的二元分化……真正从产业联动、文化与经济协调的意义上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2]。他提出了“共创价值”^[3]的概念,包括:倡导乡村手工艺产业、乡村休闲产业、乡村健康休闲产业、乡村“互联网+”产业、乡村研学体验产业的特色发展之路,如启用“民间工艺乡土回归计划”;购买第三方服务,将乡村文化产业纳入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支持民间文艺和工艺与当地中小学的校本课程联动,纳入国民素养教育体系;完善非遗文化传承人的认定、保护和传承机制,针对传统乡镇特点,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传统村落人文生态的共建与共享。村民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主体,既是创造的主体,也是传承发扬的主体。人才短缺是乡村落后于城市的根本原因。如何将外部主体与村民主体力量有机融入,形成既有历史文脉又能可持续发展的新乡村文化,就需要建立一个多元、开放、融合的运行机制。目前,我国很多乡村内部村民主体和外来的社会力量构成了形式各异的乡村建设共同体,为营造和谐平

[1][美]杜威·索尔贝克:《乡村设计:一门新兴的设计学科》,奚雪松、黄仕伟、汤敏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7-20页。

[2]潘鲁生:《美在乡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141页。

[3]见潘鲁生在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协办的2018“乡村营建”主题沙龙上的发言。

等的乡村文化秩序奠定了基础。外来的社会支援主体为乡村的振兴带来了技术、文化和资本,呈现出社区、社会组织、群团组织等“多元主体共治新格局”^[1]。乡建离不开多元的建设主体,要集聚社会力量和乡建基金,培育具有乡土情怀、素质全面的乡村建设人才队伍。通过定期举办乡贤座谈会和乡建论坛,培养管理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乡土意识和复兴村落文化的共识,创设激励制度和活动,激发主体的文化认同;组织大中小学生到乡村实地体验学习和实践;发行相关信息和刊物,举办绘画、摄影、土特产包装设计大赛等,唤醒和激活当地村民和大众的多元价值观,强化其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的担当精神与社会责任感。

中华传统村落既是人、建筑、社会与自然环境等要素的整体构景,更是人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文化精神的动态演变。传统村落景观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生存的载体、一个整体彰显地域文化的家园,更是一个个特殊地理环境下的文化综合体,蕴藏着人居相依的构成原理和技巧,其构建的基本思想是人工环境与大自然环境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统一。数千年以来,中华文明经历了各地域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最终形成统一而多样的特征,各地域的地理条件、社会发展、经济形式和风俗礼仪等正是促成中华传统村落呈现多样性的文化基因。赋予中华传统村落文化生态新的生命活力,要从时代特征和时代需求出发,既要以全球化的视野,融通古今中外的文化力量,通过记忆构建的策略,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文化、自然之间互生共融的互动关系,增强对中华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核心价值的认同;又要融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构建走向未来的空间记忆文化工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中儒家“五常”的做人原则、道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广大乡村“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礼治文化,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当前,我国对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价值重塑问题的理解还处在一个初期阶段,由于城乡和地区差异的存在,城乡之间在公共文化资源统筹、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对乡村传统文化内核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走进新时代,我们要以呵护之心珍爱土地,保持乡土特色,构建乡土记忆,走差异化品牌发展之路;还要健全人才机制,从人才培养、创新创业环境和项目孵化等方面吸引乡建人才回流和集聚;更要向未来的乡村注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通过文化创意拉长和拓宽产业链,激活乡村农业的市场活力,促进城乡互动发展和文化生态的整体平衡,有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责任编辑:平 啸]

[1] 戚晓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变迁与机制创新》,〔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